

# 论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五个问题

陈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 上海 200241)

**【摘要】**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怎样认识、理解和贯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成为当前思想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思考: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本质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有没有不同的形态?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本环节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与现代新儒家的区别是什么?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帮助是什么?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2X(2014)05-0004-05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近30年来, 这不仅成为人们的共识, 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热点。特别是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 “国学热”、“儒学热”不断升温, 怎样认识、理解和贯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成为当前思想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里就相关的五个问题简略地谈点看法。

##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本质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就其理论建构来讲, 在本质上是既接着马克思主义讲, 又接着中国传统讲, 是这两个接着讲的统一。毛泽东在延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 正体现了这一点。他一方面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 必须读, 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sup>[1]</sup> 另一方面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文化历史遗产, 反对

“言必称希腊, 对于自己的祖宗, 则对不住, 忘记了”。<sup>[2]</sup> 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这两个接着讲的统一。《实践论》既接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讲, 又接着中国传统的知行观讲; 《矛盾论》既接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讲, 又接着中国传统“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变易论讲。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同样体现了这一点。他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新事业, 马克思没有讲过”, 重新“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 有些新话”, 但我们“没有丢马克思, 没有丢列宁, 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同时, 他指出: “要懂得些中国历史, 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sup>[3]</sup>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接着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讲, 又是接着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讲。如果综合上述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论述, 用形象的比喻来说,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就是接着马克思和孔夫子这两个“老祖宗”讲, 是这两个接着讲的统一。这意味着如果只有一个“接着讲”, 无论是接着马克思讲还是接着孔夫子讲, 都不可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这两个接着讲的统一, 并不意味着拒斥或漠视

陈卫平 /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方文化传统，特别是现代西方文化。因为马克思主义就其本源来讲，是从西方文化传统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在现代西方文化中仍然以某种形式显示其存在；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来讲，显然不能撇开西方文化所蕴涵的关于具有时代普遍意义的思考。对于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而言，也是不能无视西方文化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之间经历了近代的变迁，而这一变迁与西方文化的涌入和影响有着重大的关系；同时我们今天对于传统文化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来自西方的概念、范畴、命题为基础的。毛泽东要求记住自己的老祖宗，同时认为“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sup>[4]</sup>他还指出，康德和黑格尔的书，“需要读一读”，否则，“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sup>[5]</sup>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充分表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世界现代文明的联系。

因此，这两个接着讲的统一，一方面使得马克思主义有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同时是以中西文化融合，走向世界文化为理想的。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者对话的综合创新。当然，如何做到这样的统一，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也是当前正在继续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有没有不同的形态？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上述的两个接着讲，但是这样的接着讲实际上有两种形态，即作为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作为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这种区分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的客观存在为依据的。回顾历史，就哲学而言，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的；作为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张岱年综合唯物、理想、解析的“新唯物论”为代表的。这两种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主体是不能互换和替代的。当时张岱年和艾思奇的争论表

明了这一点。1935年张岱年发表了《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指出中国当时所需要的哲学应是唯物、理想和解析三者的综合创新，实际上勾画了他的中国化的哲学理论即后来的“天人五论”的轮廓：既是以“西洋哲学最新潮流”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为“倚重”，又是“从中国本来的传统生出的”。<sup>[6]</sup>在《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发表后不久，艾思奇撰写了《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答金放然君并求教于张季同先生》（张季同即张岱年），对张岱年综合创新的哲学构建提出质疑，以为这是教授书斋里的哲学，而不是为解决现实斗争的问题提供指南。

这里不对这场争论进行具体分析，只是想指出这场争论实际上表明在当时存在着两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理论侧重点有所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理论侧重点在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和回答中国现实问题；而张岱年的“新唯物论”，其理论侧重点在于如何将“唯物论之再扩大”和中国本来的传统相衔接。比如，在人生理想方面，“新唯物论虽颇注重理想，而对于理想之研讨，实不为充分”，而“中国哲学是最注重生活理想之研讨的，且有卓越的贡献，我们既生于中国，对于先民此方面的贡献，实不当漠视，而应继承修正而发挥之”。<sup>[7]</sup>因而他的理论构建的重要方面，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梳理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并与之相结合。区分这样两种形态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在于：使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摆脱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释者的身份，把在学术领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自己的使命，这一工作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sup>[8]</sup>

区分不是分割，两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是互动的。这种互动不仅仅是思想观点的互相启发和推进，还是互相的支撑和依靠，即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为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引领，而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则会极大地巩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成为学术领

域的旗帜。

###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本环节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新的理论形态，有着与其在西方不尽相同的面貌，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取得了新形态，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成了其重要的思想资源。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构贯穿着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三个互相联系的普遍性的环节：变革、融合、制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变革（解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现代与前现代的时代性差异，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是变革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和产物：没有这样的变革，马克思主义无法在中国显示其影响，只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拒斥或同化。这样的变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中国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对于传统文化已经做了很多反省和改造。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否定对于传统文化的反省、批判，或者把这些反省、批判简单地斥之为激进主义而嗤之以鼻。其实，认真而深刻地反省、批判传统文化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需要的。当然，如何变革传统文化，变革传统文化的哪些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域中是有差别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以马克思主义变革中国传统文化是为了使人们认同马克思主义，对于任何外来新的思想理论的认同，实际上都是将其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与本土传统文化的融合。否则，外来的思想理论就会被看作纯粹从外国输入和强加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没有根基的，与以往的本土文化是断裂的，没有历史延续性的，从而很难获得认同感。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自觉地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一般来说，两者融合的基础是它们具有某种相似性。尽管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时代性、民族性差异，但两者所要回答的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问题在内涵上是有相通性的，两者的差异表现在对这些根本问题的提问方式、侧重方面、言说方式、所得结论上。更重要的是，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是对前资本主义文化的否定，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揭示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为己任，代表了后资本主义文化。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于前资本主义文化表现为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仿佛是对前资本主义文化的复归。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了哲学领域里的这种复归，即从前近代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相结合的阶段，经过近代的机械唯物论阶段，发展到辩证唯物论阶段。由于仿佛是复归，因而马克思主义与前近代文化无疑具有相似性。中国传统文化显然属于前近代文化，所以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相似之处。这就使得两者的融合是有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将这两者处于自在状态的相似之点予以自觉地融合，从而使其与传统文化有着历史的连贯性，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予以自觉融合的重要方面是两者概念的相互诠释和发明，这样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构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范畴就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含义，而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就有了中国的意味。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变革和融合这两个环节是有内在的联系：变革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弃，同时也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提升；融合是在变革传统文化中实现的，同时又使变革获得历史的继承性。然而，无论是变革还是融合，均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为前提。理解总是在主体的“前理解”即原有观念结构的作用下发生的，而传统文化在主体的原有观念结构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因此，传统文化作为主体的观念结构的组成部分参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使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渗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构中。所以，传统文化的制约，与变革、融合交织在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环节。这样的制约有着正负两方面的意义。比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以“大同”来指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传统的“大同”理想主要是一种道德理想，以为社会理想的实现取决于道德境界的

提高。以“大同”来理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显然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制约，其正面作用是使中国人比较容易把握这样的社会理想的价值目标是“天下为公”，其负面作用是把通过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看作是不断“斗私”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忽视了发展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反省这种制约的负面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而这样的反省无疑是变革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从这个意义讲，变革、融合、制约是三个循环的环节。

####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与现代新儒家的区别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与现代新儒家的保守主义在如下四个问题上是有区别的：一是如何呈现和揭示儒学传统？现代新儒家基本上坚持道统说，以此来阐释儒学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从正统儒学和非正统儒学的相反相成来考察儒学传统，而且更多地以后一方面作为自己的历史根基。二是如何认识儒学在当代中国的价值？现代新儒学试图将儒学重新确立为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把儒学作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资源，但这决不是儒学原有价值的翻版。三是如何确定评价儒学的价值尺度？现代新儒学将工具价值尺度与内在价值尺度相分离，内圣开出新外王之路至今无法走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将这两个价值尺度统一起来，不仅从外在的时代根据，而且从内在的民族智慧来评价儒学。四是如何看待儒学的人格理想？现代新儒学坚持以圣贤人格为导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提出平民化的人格理想。前者使得人格理想流入玄虚和空泛，冯友兰的“天地境界”已在这方面提供了前车之鉴；后者则把人格理想扎根于现实的土壤。眼下有关弘扬传统文化的论说和实践，往往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新儒学的区别。其实，这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已有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过这两者的区别，如侯外庐、陈家康、杜国庠、胡绳等。我们应当在他们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情况，深入研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如何可

能、如何定位。

#### 五、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帮助是什么？

我们今天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传承、弘扬传统文化，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让当代中国人知道我们的祖先有哪些文化遗产。毛泽东在总结和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这一份珍贵遗产”的名言中，有句话人们往往不太注意，这就是他强调承继这份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那么今天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能够提供哪些重要帮助呢？这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候需要着力思考的。我从以下三方面思考了这个问题：

首先，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涵义，是指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中国国情的重要部分。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族传统文化不是断裂的，而是接续的。也就是说，总结和继承传统文化原本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如果丢掉了对于传统文化的总结和继承，所谓的“中国特色”是无法成立的。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贡献，是提出了“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他之所以将传统文化看作“珍贵遗产”，并非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见这份遗产对于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有重要的帮助。事实上，他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及作为其哲学基础的《实践论》、《矛盾论》就表明了这一点。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证明了总结和继承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有重要帮助的。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来看，从邓小平把“小康”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联系，到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再到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充分反映了总结和继承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起的重要帮助作用。因此，努力总结和继承传统文化，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需要。

其次，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关系。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是以实现现代化为指向的,但其所要建立的现代文明又是不同于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这样的文明形态既是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超越,又是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复归。这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为依据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历史的发展表现为由原始公有制到私有制再到共产主义公有制的螺旋式上升,这个运动过程仿佛是向出发点的复归。因此,取代资本主义之后的理想的文明形态也仿佛是向前资本主义的传统文明的复归。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句名言:“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这其中的重要涵义是:当资本主义进入自我批判阶段,即以其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诸多弊端得到较为充分暴露时,我们才能认识到前资本主义文明的某些传统是宝贵的,并应当在后资本主义文明中重新激活。就在同一篇文章里,马克思把古希腊文明与现代文明作比较,把前者比喻为人的纯真童年,然后说道:“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地在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之后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马克思、恩格斯都对此予以充分肯定。就是说,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作为传统文明在后资本主义的更高历史阶段的再现复活,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国学热”在中国经过30多年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之后出现,正是这一历史必然性的体现。

再次,阐释借鉴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关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作为精神动力。邓小平在谈到振兴中华民族时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传统文化是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蕴含着很多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十分有意义的思想资源,诸如天人合一、仁者爱人、民为邦本等,对此进行阐释显然有利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构建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这方面的阐释人们已经做了很多。我想讲的是传统

文化的建构形式对于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所具有的借鉴意义。我们一般会把《四库全书》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传统文化之所以用“四库”的形式来建构,蕴含着对于如何建构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思考。《四库全书》的编撰是在清代中期,传统的封建社会经历了两千多年,对于如何建构与之相应的核心价值体系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四库”之“经”,体现了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贯穿着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思想、基本路线、基本原则。“四库”之“子”,反映了核心价值体系不是“经”的一元独霸,而是吸取了多元的思想资源,“经”与“子”的关系,是一元与多元、主旋律与多样性的关系。“四库”之“史”,显示了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观是有历史依据的,是对以往历史经验的总结。史籍是以往事实的记载,因而“经”与“史”的关系,是“理”(道)与“事”(器)的关系,理从事出,事以证理,由此作为核心价值之“经”就有了被历史事实所证明的合法性。“四库”之“集”,表明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不是干巴巴的说教,而是赋以艺术形象从而打动人、感化人。“经”与“集”的关系,是“理”与“情”的关系,理合于情,以情入理。于是作为核心价值之“经”就容易入耳、入脑。显然,传统文化以“四库”形式建构核心价值体系,对于我们如何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构是有借鉴意义的。

####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9.
-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79.
-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8、91、369、358.
-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1084.
- [5]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93.
- [6][7]张岱年文集,第1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210-226,211.
- [8]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0.

本栏责任编辑 曹宁华